

刊的高潮。^①

第三节 文化市场的培植 与职业文人的写作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是中国近代报业和印刷出版业由孕育诞生逐步转入普及社会的过程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书报业的商业经营举措已在行业中推行。书局、报馆的经营者懂得用招徕读者、顾客的办法,扩大文化市场,增加书报的赢利。与此同时,报业与印刷出版业开始孕育着产业分离,形成近代意义上相对独立的报业、出版业。

80年代报业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确立了报刊的基本格式和社会运作方式。一是报刊的格式由原来的书册式改为单页式(有的是一页4开);二是栏目定位于社会新闻、本埠消息为主,真正体现出报纸的新闻传媒的性质特征;三是出现专职的随访记者,报业内部分工专业化特色开始显现;四是报刊的社会辐射面由原来的局部地域辐射,扩大到全国的一些重要城市。如,上海的《申报》因为刊有大量社会新闻和清政府的情况通报,而成为当时缙绅士人普遍关注的读物。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围绕近代报刊的商业经营意识展开的。由于一些日报大都是外商和民间所办,要赢利必须靠发行量的增加来获得。如何来扩大发行量呢?当然是靠刊登能够吸引读者的消息和娱乐内容来刺激读者的报刊消费。所谓能够吸引读者的内容,往往是那些普通人所关心的最新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新闻,

^① 如,黄遵宪就是受到《万国公报》及江南制造局所出之书的影响,而开始关心时务,并意识到报刊等对世道人心的影响作用。参见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20页。

要求报刊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准确地报道。譬如,1882年7月,朝鲜发生政变,中日两国派兵入朝,《申报》迅速派驻日和在烟台的采访员报道,9月9日刊登了《勘定高丽记略》。1882年5月,法国军队攻占越南河内,并继续北上,中法战争迫在眉睫。《申报》聘用俄国人担任采访员,报道了中国黑旗军与法军交战的情况。1884年5月8日,《申报》馆又创办《点石斋画报》,用可视的图画形式,将读者关心的新闻内容传递给读者。譬如,中法战争中法国军队用的气球、水雷、巨炮等,画报都以图画的形式加以报道,开创了“画新闻”的先例。由于画报创办之初外地来稿较少,《申报》于6月间刊登广告,招聘名手画新闻,作品一经发表,即付酬劳。《申报》对刊用来稿支付酬金,由此开始了近代中国的稿酬制度。^①

社会重大事件的报道,构成了普通读者阅读兴趣的“重”的方面,而娱乐消闲通俗类作品和市井笑话,则成为报刊内容的“轻”的方面。一些大的报刊在周日或其他节日,往往有“附刊”赠阅读者,而“附刊”所刊内容,除了商业广告、演剧消息外,主要就是文艺类的作品,这是近代报纸文艺副刊的雏形。报刊本身留有文艺栏目,刊登一些诗文、随笔、小说之类的作品,但以通俗、可读性强为主。譬如,《申报》自创办不久,就刊发竹枝词,内容诙谐,言语活泼,多涉及眼前的人和事,当新闻读可以,当诗谜解也可以,还可以当笑话看,读来轻松有趣,不用多费心思。^②《申报》还以连载小说的方式吸引读者。譬如,1872年4月,接连连载了英国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的第一部分,名为《谈瀛小录》,美国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名为《一睡七十年》。1873—1875年《瀛寰琐记》又连载了英国小说《昕夕闲谈》。^③这些所谓“轻”型的文艺类作品,相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而言,大都是表现平常人的生活琐事,其中不少是描写和记录名士风流、儿女情长的故事。之所以形成这种内容风格,很大程度与报刊的

① 参见宋军:《〈申报〉的兴衰》第40—41页。

② 如《沪北竹枝词》,刊于《申报》1872年5月18日,署“海上逐臭名稿”;同日有《续沪北竹枝词》,署“忏情生草稿”。

③ 参见吴文治:《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下),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3006页、第3008页。

阅读对象有关,一般而言,报刊的读者大都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普通市民,他们读报的目的,除了知道新闻,再就是消磨时光,以助茶余饭后的谈资。所以,琐碎的生活事件、有趣的凡人故事,可以持续不断地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们的阅读要求与一般的文人雅士的趣味和追求相比,当然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报刊读物既然需要靠普通读者的购买力来维持,就迫使报刊经营者不得不刊登那些凡人俗事来招徕读者。其中竹枝词、小说,因其从俗从“轻”的格式与内容特征,较之其他种类的文体更适合报刊。从文学史的角度讲,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各类文体发展极不平衡,而小说一类是所有文体中发展最快、社会影响最大的。在追溯近代小说成长的原因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近代小说一枝独秀、以至成为近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的直接原因,就是与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有关,而这些读者的获得主要就是通过报刊近代传媒手段实现的。相比之下,那些文人雅士的诗文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可能要高于近代小说等通俗类型的作品,但这些文人雅士的作品大都只是在自己的三五知己小范围内传阅,影响非常有限。而且,这种文人小范围的传播方式与文学作品的传统传播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它既不追求商业利润,又不寻求广泛的社会影响,而是文人遣兴抒怀的个人表达方式而已,这与近代以报刊为依托的具有公共特性的时评、小说等文体相比,从写作动机到社会影响完全不同。从这一意义上讲,真正具有近代特征的文学样式和具有发展潜力的文学写作,无不是与近代报刊杂志联系在一起的,而那些有眼光的文学史家正是以这种近代特征来衡量 19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指出小说一类文体在近代崛起的重要意义的。^①

报刊作为沟通社会信息的传媒,它的发展速度是与技术进步、社会体

^①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对 1872 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进行概括时,认为“在这五十年之中,势力最大,流行最广的文学,——说来也奇怪,并不是梁启超的文章,也不是林纾的小说,乃是许多白话小说。……这一段小说发达史,乃是中国‘活文学’的一个自然趋势:他的重要远在前面两段古文史之上。”假如我们考虑到胡适所列举的这些近代白话小说,大都是通过报刊连载或机器印刷方式出版传播的话,就更能体会到小说作为一种近代文体在文学史领域的异军突起,的确是适应了近代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并代表着这种近代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收入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 年版,第 94 页。

制的革新有密切关系的。就 19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而言,原来制约报刊印刷、发行的技术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机器,并在国内大城市之间建立了发行网。但报刊要更进一步服务社会,报业要更进一步地发展,在信息传播技术和社会保障体制方面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所谓信息传播技术的问题,是指报业的发展应与当时最先进的电报传输技术联结起来,形成更快捷的信息沟通渠道。事实上,对这种传播技术的社会需要在当时已显得十分迫切。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大报最基本的职能之一,就是通报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商情。以当时上海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茶叶为例,上海茶叶的收购价格和出口量,直接与国际茶叶市场的行情有关,当时国际茶叶交易中心就在伦敦,但从伦敦到上海的信息传递却非常不便。^① 因此,以外贸为主的上海要想有进一步的高速发展,以有线电报为标志的近代通讯手段就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上海的外商就已经着手有线电报的架设,但受到清政府内顽固派的抵制。1871 年 2 月,丹麦大北电报公司铺设的海底电缆从海参崴接到上海,这样通过海参崴,欧洲到上海的电报只要一天就能沟通。1876 年初,英商大东电报公司铺设上海至香港的海底电报线,而经香港到新加坡至伦敦的电报线路也被联结起来,在外商纷纷抢滩中国的电报电讯业的情况下,洋务派从自身利益出发,在 19 世纪 80 年代也积极推进有线电报的建设,李鸿章递呈《请设南北电报片》,建议设立京沪之间的电报线路。1880 年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1881 年 4 月,天津、上海之间的有线电报同时从两地开始架线,11 月完工,12 月线路开通。由于上海是当时中国外贸中心,有线电报使用率很高,电报业的发展也非常迅速,不久便形成了连通欧亚、辐射京津沪和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沟通东南亚地区的

^① 1868 年 10 月 7 日,英国人赫德给一位朋友写信,信中说:“您于 9 月 9 日从巴黎发给我的电报,这封电报由雅加达转来,到我手上已是本月(指 10 月——引者)5 日了。”“它从巴黎到雅加达,只花了两天的时间”;而从“雅加达到我这里(指北京——引者)却花了整整十四天。”“至今电报还不能直达北京,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啊。”由此可见中国与国外,特别是欧洲信息沟通上的困难。转引自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 239 页。

庞大有线电报网络。鉴于这种现实,1884年,清政府同意将电报总局从天津迁到上海。有线电报的开通,解决了报刊信息传送的技术问题,原来从北京传到上海的消息,靠骑马传送需一个月,后来通过天津的轮船传送,缩短到一个星期。而有线电报开通后,京津两地的消息就能迅速在上海的报上刊登。1882年1月16日,《申报》第一次通过津沪有线电报传送新闻消息。以后,每年的殿试发榜,《申报》都用电报传递刊发,在江南一带引起轰动。在新技术的帮助下,近代报业在80年代逐渐产业化,也就是说,它已经摆脱了实验阶段,其价值和社会影响已被社会普遍接受,人们对报刊的需求和依赖感开始产生。看报的读者,已不只是商人、市民,而是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人们看报不只是为了了解商情和社会新闻,而是转向对民意和社会舆情动态的掌握和了解。因此,在19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变法维新运动来临之际,一些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便明确意识到可以运用新的文化传播工具——报刊,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如,1875年,王韬撰写了《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认为报刊是社会的舆论工具,表达“庶人之清议”,代表了民意。^① 康有为1882年参加顺天乡试,返回故里途经上海,为海上之繁华所震惊,回到广东后大读西方书,1883年购得《万国公报》,受到启发,从此“绝意试事”^②。换句话说,康有为自己就是被《万国公报》在内的报刊杂志的宣传所启蒙,先是上海一地的报刊出版现象给他以直观的刺激,后有报刊文章的内容启蒙,这些使得包括康有为在内的维新派人士意识到报刊杂志的社会作用,就有了后来的办报办刊。至于梁启超后来干脆将兴学、办报和组织学会总结为近代社会的三大重要文化现象。这些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包括对近代文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想人物,他们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登场亮相,但假如我们注意到他们接受和传播新思想的方式和手段的话,就会意识到:其实所有的思想转变和可资利用的传播手段,在19世纪80年代

① 参见《弢园文新编》第109页。

② 参见《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页。

都已经打下了基础。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和新的政治主张,事实上都是在报刊杂志、新学堂和沿海地区这些新的社会基础上所产生的新生事物,是近代化社会运动的最终产物,同时又是近代化社会的基本构成。

如果说,19世纪80年代,报业在新技术的推动下有了惊人的发展的话,那么,印刷出版在此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发展的特征在于,80年代印刷出版走的是与报业分离的轨道。报业的发展,是朝争取普通读者、开拓文化市场的方向发展,而印刷出版,是朝着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满足学校教育新需要的方向发展。所以,80年代的印刷机构差不多都把适应新的教育要求、编撰和出版学校教科书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同文书会。同文书会1887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其英文为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它是由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联络赫德、林乐知、慕维廉等人组建而成的印刷出版机构。1894年改名为广学会。同文书会虽然也出刊物,如《万国公报》、《孩提画报》等,但传播西方文化、编译出版书籍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据《同文书会发起书》所言:“本会的目的归纳起来可有两条,一为供应比较高档的书籍给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阅读,二为供应附有彩色图片的书籍给中国人家庭阅读。”^①从同文书会的发起宗旨中,我们不难看到商业赢利不是它的目的,而靠出版宣传新教教义的书籍,通过教育启蒙的手段,最终感化中国的士人和普通家庭,倒是同文书会的目的。所以,出版在传教士眼中是适应并辅助新式教育的手段。要教化中国人,就要办新式教育,让中国士人从传统的经学和举业中摆脱出来。而要办教育,就必须建立印刷出版机构,编撰和出版新式教科书。到1890年止,同文书会可考的出版物有《自西徂东》(作者花之安,1888年出版)、《格致新机》(作者慕维廉,1888年出版)、《圣经历史挂图》(作者不详,1888年出版)、《女儿经》(作

^① 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六章“广西国之学于中国”;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十三、广学会:广西方之学”;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广学会与西学的传播和维新运动的兴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2—408页。

者不详,1888年出版)、《耶稣纪要》(作者不详,1888年出版)、《西铎》(作者李提摩太,1889年出版)、《正道启蒙》(作者不详,1889年出版)、《基督实录》(作者不详,1889年出版)等。其中花之安的《自西徂东》影响最大,1888—1911年间,共发行54000册。同文书会的出版物的传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赠阅形式流传的。如,1888年将《格物探源》一书2000册在南京、北京、杭州、奉天、济南赠送,后扩展到内地,及台湾、香港。^①

以同文书会为代表的有着教会背景的出版机构发展的同时,中国本土的书局在19世纪80年代也得到发展,这些本土化的出版机构大都是民营的,它们虽也与学校教育相联系,但思想文化的教化色彩没教会出版机构那么浓,中国的民营出版机构大都是围绕商业利润运作,趋利成为这些早期民营出版机构的追逐目标。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民营书局只是在扩大民间办书局、带动社会对出版产业的需求、及促进近代出版空间发展这一意义上,表现出自身的价值。其中比较有规模的书局有1882年创办的同文书局。据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所记:

……同文创之者为粤绅徐鸿甫,及徐雨之之族第。鸿甫有姊妹行某女士,曾削发皈依三宝,然以门第故,于都中贵胄极有势力。时西后颇留心词翰,欲翻印《图书集成》百部为颁赏文臣之用,徐调得之,乃请女士为介,得引进内务部承办此差。初领内帑三十八万两,订造一百零一部,其板圈字样按照原式放大十分之一,用上等桃花纸石印,原有脱笔均需描补,内一部用黄绫图龙钉备宸览外,其余百部仅普通道地而已。^②

同文书局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近代机器印刷出版机构,由广东人徐鸿甫、徐润创办。徐润,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早年在上海英商办的宝顺洋行任买办,后自己开设宝源祥茶栈。1873年被李鸿章委派为轮船招商局会办。可能是通过这些洋务活动,徐润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在

① 有关同文书会出版物的书目和流传数字,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第393—394页、第404页。

② 陈伯熙:《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177页。

获悉慈禧太后要投巨资翻印《古今图书集成》后,他不仅接到了这一印书项目,而且,与表弟徐鸿甫一起,在上海虹口租界东熙华德路师善里(今东长治路商丘路西北转角)置地,购买20台石印机,雇佣500人,开设印书局。该书费时3年印成,耗银50万两,是当时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书局又翻印《佩文韵府》、《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等大部古书,满足士子求学和阅读的需要,书局事业兴旺,甚至在英租界九江路及北京开设分馆。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将它与英商办的点石斋印书局及宁波人办的拜石山房并举,认为“三家鼎立,垄断一时,诚开风气之先者也”。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变革,加之书局经营不善,到19世纪90年代同文书局便逐渐衰落,1893年遭遇大火书馆机器设备全部烧毁,1898年书局关闭。^①这些书局的兴起与最后的倒闭,事实上是与晚清教育制度的变革历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举业成为士人追逐的重要目标时,适应于读书人需要的古书翻印就有市场,而一旦科举改革、八股文遭废除,古书翻印就渐渐失去市场。而那些办印书局的书商因缺乏文化眼光,不能及时调整转向,理所当然会被后起的一些译印新式教科书的印书馆所取代。

第四节 书报业的独立 与文人办报办 刊的尝试

19世纪90年代书报业的发展,以中日战争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

^① 有关同文书局的材料,参见范慕韩:《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第248—249页“同文书局”;薛理勇主编:《上海掌故辞典》第321页“同文书馆”条目;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第583页“徐润”条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姚福申:《中国编辑史》第5节“石印书刊的兴起及其成功原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5页。